

明清情欲論述與禮秩重省

Ming and Qing Dynasty Discussions on Desire and Reflections on Rites

張壽安 (Chang So-an) 呂妙芬 (Miaw-fen Lu)*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4-8

壹 ● 「禮教與情欲研究群」之成立

1997年9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時任文化思想史組主任的熊秉真教授、張壽安教授、黃克武教授的推動下，成立了「禮教與情欲研究群」，由張壽安教授任召集人。張教授簡述成立說明：

十七世紀以降，中國社會文化呈現出兩大走勢：其一為「情欲覺醒」，其二為「禮學復興」。這兩股看似對立卻又不斷對話的思想力量，是觀察中國近代與前近代之銜接的重要線索。明清以來，中國傳統社會倫常規範，不只在一個市場經濟活絡、城鎮繁興、人口增殖、文藝活動頻繁、知識多元、政治宗教欲張彌弛的歷史情境中面臨挑戰而出現蛻變，也在日益變化的個人與群體關係中開創新秩序。凡此現象，正可觀察18、19世紀知識界所面對的困境與搜求之紓困之方。本議題之目的在重新檢討明清時期所謂「傳統中國的真正面貌」，並發掘其內在文化之曲折變化，以窺探前近代中國社會的現代性走向。

參與者有：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熊秉真、張壽安、黃克武、民族所余安邦、文哲所李明輝、及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高桂惠等教授。這些學者具有史學、理學、經學、文學及心理學、文化人類學、西方哲學、西方文學理論、新文化史學及兩性文化研究等多種知識背景。當時的構想是從各個相關學科切入此一議題，以觀察中國

近代社會文化的禮教與情欲之衝突，及其可能之轉型。

其後展開了一連串的學術活動，包括：講演、座談、讀書會、研討會。並在熊秉真主任的積極推動下，和中研院院方之研究單位由熊秉真教授主持的「明清研究會」、及中研院民族所余安邦教授主持的「情與中國文化工作坊」合作，進行聯合性質的講演會、小型討論會。並進而得與國立政治大學蔡錚雲教授主持的「現象學與人文社會的對話」研究計畫中的哲學學者、病理學學者、精神衛生學者相互「對話」。使「禮教與情欲」的研究，在學術界引發更大的研究力，滲入更多樣貌的知識探索。近年來，「禮教與情欲」正逐漸形成為一個新興的研究議題，而且潛力無窮。

中研院近史所文化思想組在1997至1998年間的「禮教與情欲」學術活動系列，主要以一場小型研討會的方式呈現，研討會之前，更針對議題，舉辦四場專題演講，分別請到徐泓、汪榮祖、于君方、和Gerald Hammond主講。該系列學術活動的成果後編成《禮教與情欲：近代早期中國文化的後／現代性》一書，由近史所於1997年出版。

一、四場專題演講的講題與內容：

徐泓教授（臺大歷史系）的講題是「傳統中國大學的空間規劃——明南京國子監」，主要根據明文獻重構明代南京國子監的校園空間規劃，包括祭祠區、教學區、生活區、植樹景觀等，並據此說明國子監校園的空間安排與儒家理想精神的關係。

* 張壽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呂妙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汪榮祖教授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的講題是「清帝的樂園與失落：圓明園情慾世界探索」，從圓明園的興建、擴充、到衰亡的一百五十年間歷史談起，論及五位帝王在園中的生活、帝國主義侵略導致園毀的下場、以及因此圓明園在近代牽動中國人心的複雜情懷。

于君方教授 (Rutgers University) 講論「明清的觀音信仰：性別、佛教與民間教派」，于教授根據三種明萬曆間寶卷，試圖重塑觀音信仰與無生老母信仰的關係，說明無生老母信仰可能受到觀音老母形象的影響，也指出老子《道德經》中「母」的意涵、西王母、王母娘娘、佛教文獻中女性信徒形象、以及中國社會中的老婦人角色等，都可能是型塑觀音老母形象的因素。于教授論及觀音信仰對十九世紀先天教和後來一貫道的影響。

Gerald Hammond 教授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講題是「The Use of Literary Texts by Historians and the Use of History by Literary Critics: Two Case Studies Involving The Merchant of Venice」。主要是以莎劇《威尼斯商人》為例，說明晚近文學批評與史學結合的研究取徑，亦即文學研究者在處理《威尼斯商人》這個文本時，必須考慮當時英國社會中外邦族群存在的歷史情境，而歷史學家在討論十九世紀國家主義興起或馬克思意識型態課題時，則可以從《威尼斯商人》這個文本獲得重要訊息。

二、研討會發表論文五篇與討論議題四則：

Francesca Bray 教授 (UC Santa Barbara) 發表論文「Decorum and Desire: the Architectonics of Domestic Space in Late Imperial China」。這篇論文以歐洲現代化進程中演繹出的有關空間與位置的理論，來探討明清時期中國家居內部的建築，文中以四類空間表現為例，解釋空間的社會人文經驗，即家廟的位置與功能如何促進傳統禮教的傳衍、從風水觀念看家居空間表達對繁華富貴的渴望、清人對居家美學的重視、清代商人對物質與舒適感的看重。這些不同訴求的建築之間相互影響，並與儒家意識形態之作用、明清社會的商業化有密切關係。作者認為從這個議題，可以闡明儒家正統面對人性慾望時，兩者間必然的交互調適。

王鴻泰教授 (當時研究生，現任教暨南大學歷史系) 發表〈青樓名妓與情藝生活——明清間的妓女與文人〉一文，此文首先針對妓女活動形態進行考察，分析妓院

空間；接著，以妓女的「文人化」為主軸，考察「情藝文化」的發展基礎，又以士人為主角，考察士人與名妓之間如何建構起一個別於禮法之外的「情感世界」；最後，在社會文化史的脈絡下，探討此「情感世界」如何延伸進入現實生活中。

張壽安教授發表論文：〈嫂叔無服，情何以堪？——清代「禮制與人情之衝突」議例〉。此文以喪服制度中「嫂叔服制」為例，探討禮制和人情間的衝突。原本禮制上，嫂叔間不互服喪服，但在實際生活中許多嫂叔共同生活的情誼深厚，不能服喪實在有違人情。此文藉著詳細考察清代知識分子對於嫂叔間應否有服制這問題引發的辯論，一方面觀察到儒家禮制中「男女別嫌」的觀念在生活情義的衝激下，於十七世紀已呈現鬆動的現象，另一方面也試圖呈顯清代知識分子思想活動背後的社會文化意涵。

劉詠聰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發表論文：〈敦禮尚情——俞樾推介女性著作之心態表現〉。此文討論俞樾與其生命中的女性關係、及其對女性求師和求序的原則，說明俞樾對女性著作普遍抱持一份敬意，他整輯妻女作品，有個人情感的流露，感為女史題詩題序，大都含有認同和推介之意。而俞樾一生拒收女弟子，則是向禮教勢力妥協。

葉漢明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發表論文：〈妥協與要求：華南特殊婚俗形成假說〉。此文討論華南漢族社區「長住娘家」、「不落夫家」、「自梳」等婚俗，認為這些婚俗可能是儒家貞操觀與嶺南百越文化，以及婦女對擺脫傳統婚姻束縛的要求之間的一種妥協。在妥協中，女性獲得一定程度的自由，但仍受漢文化儒家正統規範的約制。另外，儒家主流文化與嶺南非主流的次文化並存而妥協的現象，也是婦女與其家庭和地方社群互動爭取的結果。

除了上述五篇論文，研討會上也安排四個議題討論，分別由林維紅、熊秉真、華璋、余安邦擔任引言人。林維紅教授 (臺大歷史系) 從政治與道德控制的觀點，討論儒家貞節的定義從早期指合宜守信的行為，到明清時代專以不再嫁為節婦的變化；也論及明清政府對婦女貞節旌表的介入，繁複的官僚程序，顯示了貞節觀趨於狹隘、壓抑人性的一面；又根據《刑案匯覽》中的性犯罪案例，指出法律對於男女之防的防弊態度，有極端道德要求的傾向。

熊秉真教授談論前近代中國對於兒童並沒有像西方一樣呈現二元對立的局面，中國從宋代程朱理學便注重兒童教育，到了明清，幼教的範圍更擴及到庶人家庭，可以說是漸漸把恣情的兒童與童年，攔進一個入理與入禮的藩籬。然而，明清之際一波波增修改寫蒙學教材時，韻文討教等強調涵養性情的教育方法盛行，又可見一股導之入情的風尚。

華瑋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介紹由吳震生和程瓊夫婦合批、刊於清雍正年間的《才子牡丹亭》一書，指出批者透露的情色觀，如認為「色情難壞」、「愛『好』（美）是人獸關」、「欲心與情迥別」、才色情三者間相生相成的關係、認同對露欲恰一境界的追求、以及反對禮教教條禁錮色情等，不僅十分鮮明特殊，也顯示在禮教與情欲對峙中，某些清代士人的觀點。

余安邦教授以「報與情——觀念的澄清與問題的提出」為引言，指出過去學者對「報」的研究，主要側重在起源與發展、相關觀念探索、於不同社會關係中的應用、不同的施報行為與原則、與宿命觀的關係、在心理與行為方面的應用等面向的討論，認為這些分析提供了瞭解傳統中國社會關係與社會行為原則的一個基礎，余教授也指出今後的研究，則應考慮「報」的心理與行為構成原則所發生的社會脈絡、心理與行為整個發生開展的過程、以及行動主體的意向性等問題，也就是文化、心理、實踐三個根本核心議題。

做為此次系列學術活動成果呈現的《禮教與情欲——前近代中國文化中的後／現代性》一書，則收錄了研討會中發表的五篇論文，以及華瑋教授由議題討論改寫成的〈《才子牡丹亭》之情色論述及其文化意涵〉，共六篇學術論文。另外，還包括三篇「問題與討論」，分別是汪榮祖教授的〈清朝皇帝的樂園與失樂園：從禮教與情欲看圓明園的興亡〉、于君方教授的〈從觀音的女性形象略論佛教對禮教及情欲的看法〉、熊秉真教授的〈入理入情：明清幼學發展與兒童關懷之兩面性〉。其中汪榮祖和熊秉真的討論文與在專題演講和研討會中的討論相近，故不再重述，于君方教授的討論文則是〈從觀音的女性形象略論佛教對禮教與情欲的看法〉，說明觀音形象從五代開始逐漸女性化，到了明朝，觀音不僅完全中國化，而且變成一位最有名的女神，而觀音形象受到中國文化深刻影響，也反映了中國人的一些基本價值觀，以及佛教對禮教與情欲的看法。此文則分別討論了

妙善公主、馬郎婦或魚籃觀音、觀音老母所代表的貞潔處女、冶艷少婦、慈祥老母的形象。

貳◎明清情欲覺醒與新情理觀的出現

十七世紀以降中國社會文化及思想界呈現兩大走勢：一是情欲覺醒，一是禮學復興。這二股看似對立卻又同時存在，看似背馳卻又不斷對話的歷史事實，形成近世中國非常有趣卻又極為沈重的文化現象。通過此一兩面性之研究，可以讓我們索驥出清末民初新文化運動時知識界所潛孕於血液與生命記憶裡的歷史思想困境。

「情欲覺醒」得分兩個層面討論：一是大眾文化，一是思想界。晚明的詩、文、小說、戲曲、民歌，處處都顯露出人性久枯於禮教而欲求掙脫解放的呼聲。《金瓶梅》之類的情色小說，姑且不論。茲僅就馮夢龍的「情教觀」說，略作論述。

馮夢龍通過詩文、戲曲、小說、各類形式的文學宣揚他的「情教觀」，所謂：「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馮夢龍讚美《西廂記》中的鶯鶯夜會張生，也歌頌卓文君夜奔相如，他更呼籲天下女子一旦認得自己的真情，就得「忍小恥，就大計，早自抉擇。」明顯的倡導女性勇敢面對真情，並追求自身的幸福。馮夢龍更將自己的情教宣揚比喻為理學家講學，但二者卻截然不同。馮夢龍說理學家講學是「講道」，他的講學則是「講情」。馮夢龍更深刻的指出理學家說性說得玄得脫了常情；至於他自己對人性的體認，則是「上下千古，一口咬定情字。」馮夢龍對「情」字的堅定，確實真切地反映出宋元明以降「理學化禮教」和現實人生之間的斷裂，名教扭曲了人性也扭曲了真情。十七世紀以降大眾文化呈現出的反理學與譏諷禮教處處可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民間文學也每舉孔孟對照程朱，說明理學家的禮教觀和孔孟原意不但不是道統一脈之心傳，根本是相違背的。如馮夢龍所言：「遇了孟夫子，好貨好色，都自不妨。遇了程夫子，柳條也動一些不得。」

思想界對情欲所做之反省就深刻得多了，不僅涉及性論的重省，也觸動儒家情理結構之再辯證。事實上，明末王學左派王龍溪、李贄都高倡情欲。王畿（1498-1583）之言，更每每被文學作品所引用。最值得留意的

是劉宗周，這位在理學上與朱熹、王陽明鼎足而三的晚明理學大師，在其《劉子全書》中明白表示不滿朱子「心統性情」、「因情見性」諸說，宗周認為朱子此言有二分之嫌。所以自己提出一套「心之性情」、「指情言性」的說法，並針對「四端」與「七情」，展開討論。四端與七情，在韓國的理學史上一直是一重要辯論，但在中國恐怕是晚明才出現的。

目前最為學界熟知主張「達情遂欲」的是清代思想家戴震。戴震對人性提出他自己的觀察，認為性有血氣、心、知。他反對宋明儒的天理觀念，倡導即物求其條理，理是客觀的存在於外界的事物當中，而不是什麼得之於天、具之於心的與生俱來的內存於性。

鮮為學界所知的是，戴震這種達情遂欲的思想在其身後一直傳衍下去。一般被學界認為只知考證的乾嘉學者，事實上幾乎都在闡揚這種新的人性論、及新的達情遂欲觀念。試舉例說明。程瑤田和戴震共師江永，也是在當時第一個對戴震義理提出批評的人，他說戴震的性論是「完全未識性善之精意」，批評戴震將心知血氣全視為性，遂使得性之本體的善無法完滿自存。不過，縱是如此，程瑤田在其《論學小記》中仍首撰〈述情〉三篇，反覆伸言情是善非惡。凌廷堪是戴震的私淑、程瑤田的學友，也是清代以禮代理的倡言人，他對人性的討論方式則完全撇開善惡，也就是說不從善惡觀點評斷人性。他只簡單地說人性有二種質素：好和惡，所有的建立道德、禮則定制，都得依據這個人我之好惡，經由這種同好同惡從而建立出人我共同遵循的禮則。事實上，從好惡觀察人，並進而界定人性，已完全落入現象界，屬經驗層次，或言氣之層次；和宋明理學直接從本體上論性，掌握性的超越意義，大相逕庭。其後凌廷堪更說：性善是上智之人、性惡是下愚之人，則完全脫離了性論的基本譜序。其實凌氏所要強調的只是人性有情、有好、有惡，而非硬生的一個理字。

乾嘉間和凌廷堪在學術思想上相呼應的，有阮元、汪中、焦循、許宗彥、孫星衍、黃式三及詒經精舍諸子等等。阮元和凌廷堪都堅決反對理學中「天理人欲」截然對立的主張。他們歸納古書中「己」字之原意，重新解釋《論語》「克己復禮」一詞。指出克己的「己」是「人、我」對稱，所以「己」是指自身，克己的意思是「修身」，「克己復禮」是以禮修身。絕非宋儒所說的己作「私」解。克己是「克制私欲」，「克己復禮」是克

制私欲使合於理。阮、凌的訓詁打破了理學中「天理人欲截然對立」的觀念，也讓思想界重新思考性與理的關係。事實上，清儒有關「克己」的重新註釋，已成為觀察清代學術思想轉向的一個重要指針，並漸為學界所重視。清儒自戴震以來一直企圖打破理學中天理人欲截然對立的觀念，而致力於重新突顯人類存活、人我交往之際的種種真實情欲。阮元在為孫星衍的新書《問字堂集》寫序時，就激烈的說出：「宋人最鄙氣質之性，蓋無氣質血氣，則是鬼非人矣，此性何所附麗？」而孫星衍則用考證的方法寫了一篇〈原性〉，從天道陰陽五行之流行界定人性。他說人之性，動則生情，情動則生欲，性有仁義禮智信之五德，也有喜怒哀樂愛惡懼之七情。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孫星衍說性動生情、情變生欲，欲是從人性中自然且必然流衍出來的。同時孫星衍更明確的說：這「欲」可能是「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欲，也可能是「貪利之欲」。把「貪利之欲」和人性直接聯繫起來，較諸凌廷堪的人性好惡說，是更落向經驗界了。至於行為之善的可能，他的理論是：因為性具陰陽之流衍變化，所以性也可因「化」而「復遷於善」，把「教化」視為首要工夫。其實，孫星衍的目的很明顯的是要指出德行、情欲和貪利都是人性所本有，同時更是人類存活之不可或缺；只要能「發而中節」，就「未嘗不善」。所以他極力抨擊理學「斷愛去欲」的主張。事實上，這些清儒根本不從超經驗界去認知人性，他們也不認為以先驗抽象的方式所認知的人性，有可能解決人類現象界的問題。換言之，這些學者並不認為從善惡上去判準人性能有效的解決現實問題。因此，他們更關切的是：如何在平衡人我各種情感欲望的同時，去建立理則，並據此理則重整社會秩序。

從戴震批評宋儒「以理殺人」，後繼的清代學者就一直在尋求如何建立一套經驗界的客觀理則。倡言以禮代理的凌廷堪，一再強調「緣情制禮」。焦循高揭「忠恕」「絜矩」，就是主張人我同心、推己及人。至於孫星衍的「格物致知」新解，更是把戴震所說的「養知」和經世實務結合起來，成為「見事之明」的「判擇能力」。

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九年（1790—1794）的五年間，孫星衍在京師總辦秋審，更是詳查案情之所有曲折，靈活用律，不拘泥於固舊之禮制，務使合乎情理。如審「護嫁母傷人」案，認為「護嫁母」與「護母」

同，子護其母，親情自然，不得因母與父之婚姻關係改變而異。完全擺脫古禮上嫁母與母地位不相等的舊說。

事實上，撇開清初的程朱陸王之爭或乾嘉的漢宋之爭，甚至根本撇開反理學這些旗幟和口號，只單純的從思想界的立論新點和努力方向來看，我們不難發現清儒面對最迫切的社會問題是：社會失序。爲了重整社會秩序，清儒強調整飭彝倫、端正禮俗。但緊逼而來在落實面尚未展開之際，思想界就面對了最尖銳的挑戰，即：「理則」與「人情人性」之間的斷裂。基本上，清儒從戴震、程瑤田，凌廷堪、阮元、焦循、孫星衍、甚至中晚期的龔自珍，都在尋求一合情合性的「理則」。我試稱此一轉變爲從「天理」到「情理」。這當中清儒的努力，不只包括直接從事義理性質之經典的重新闡釋，如戴震、焦循注《孟子》，黃式三、劉寶楠注《論語》；也包括從事《五經》注疏的學者，如凌廷堪的《儀禮釋例》、程瑤田的《宗法小記》、凌曙的《春秋公羊禮疏》、龔自珍的《春秋決事比》等等。當然，此一尋求的路子相當曲折，也相當具有衝突性。最明顯的議題該是：禮教（禮制）與人情之間的如何折衝。換言之，清儒在禮制原型之考證所得出的理，和時移勢異生活事實轉換之後的人情，難相合轍。雖然，其中竟也有規正後世禮教苛酷，偏離禮意原型之處。顯然，經典禮制在設計之初所依據之現實，在二千年間自然環境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種變化下，人文關係早已複雜多樣到或偏離於昔日禮意、或非昔日禮制所能御統、甚或非昔日禮制所能關照。因此，清代學者在這些問題上進行著艱辛的考證與激烈的辯論。當然，細密的考證是一切論戰之首要基礎。但無論如何，新的合情之理卻是如此迫切的被要求出現。

依張壽安教授目前所進行的諸項研究可以看出，清儒致力最勤的是禮制和斷獄，而禮制中又以「喪服」爲大宗。試以「嫂叔服制」爲例說明。依《儀禮》「嫂叔無服」，意指嫂叔勿需爲對方服喪服，其目的是在「別嫌」。禮制如此規定的原因是，異姓女子嫁入男家，除了丈夫翁舅之外，最敏感的男女關係莫過於伯叔，因此

禮的「男女大防」就落實在嫂叔的界分上。可是，在實際生活，嫂叔同處一家同祭一祖，同炊共祭憂戚與共；甚至舅姑早歿，幼叔全仗長嫂撫育成人。情深義重，焉能因別嫌一語即棄深情厚義於不顧？唐人韓愈就曾爲嫂服一年喪，以報答撫育之恩。明清以降，尤其乾嘉學者，有關嫂叔無服、嫂叔有服、嫂叔別嫌、嫂叔情義的種種爭論愈演愈烈，儼然成爲宗法倫理制度上的一大論辯。其他如：妾子爲生母宜服何服？過繼子爲其生父母宜服何服？都是圍繞著禮制與人情之糾葛所展開的辯論。當然，這當中也有一些突破。如對「室女守貞」觀念的澄清。清儒的考證指出依《禮》「親迎」才是夫婦身分之確定，未親迎即是未嫁，以未嫁之身爲陌生男子守節，是荒謬失禮的。這些，清儒在考證古禮之後所揭示的「理」，確實也糾正了當時通俗的禮教觀念，在思想上有廓清作用。總之，清儒對這類問題進行分析、反思與辨論，表明知識界正面對情欲覺醒後的人倫秩序重整。

大眾文化中所呈現的情欲覺醒，層面相當廣，不只是男女之情、親子之情，更有婦女的創作欲望、成就欲望。而思想界所思考的「達情遂欲」，其落實處則更形嚴肅，多指的是制度修正、析理斷獄等人生終極是非裁決之事。十七世紀以降情欲覺醒最直接促成的就是新情理觀的出現，它的特點在：即事言理、即人我之情言理。「理」之所以能擔任「物則」「規範」的作用，不是因爲「理本諸天」，而是因爲「理原諸情」。此一從「天理」到「情理」的轉向，或可視爲近世文化思想之一大走勢。當然，這當中還有許多歷史現象得作更詳細的釐清。至於此一思想界所面對的困境，或其反省，是否已到達新文化運動時所追求的個人獨立，即所謂自然人或個體人權的事實存在，以目前的研究來看還言之過早。不過，我們可以肯定的是當時知識界確實實認知到情欲與禮教（禮制）之間的懸離與隔閡，也意識到人性的被扭曲，同時致力於倫理關係、甚至法理制度之反省，並企圖在人的情欲基礎上，重建理則。

漢學研究通訊

贈閱對象爲：海內外漢學學術機構、學校或團體；個人限助教授或助研究員以上者。

凡索贈本刊之學者請書名姓名、學歷、所屬機構或學校、研究主題、已出版之主要論文或專著等項，寄臺北市 10001 中山南路 20 號「漢學研究通訊編輯部」收。